



大學排名榜：困惑、影響與反思

Tuesday, March 12, 2013

何順文

在高等教育界，目前至少有十多個環球(或地區)綜合性大學排名榜，但較受報導和為人注視的，就是QS、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 (THE) 及上海交大(SJTU)。也有單衡量研究論文的Webometrics、SCIMAGO與台灣HEEACT等排名。另外還有各項MBA排名榜。本文集中討論綜合性大學排名榜。

這些不同排名榜的目的從來不清晰，但估計是與評比「最佳」、質素、表現或聲譽有關。另外，他們所採用的指標及方法各有不同。

理論上，一些人相信，如果排名能以全面、專業、客觀、獨立及公正的方法進行，排名結果應可對院校的質素與表現帶來持續改進。準確可信的評分或排名結果可協助一些學生更有效選擇學校或課程。院校負責人也可利用排名結果提升知名度。

但可惜大學排名遊戲有天生的缺憾。大學不是一般市場商品或企業，其多重的社會目標及軟特性不容易或不宜作評比，也不適宜用簡單的單一數字來表達一所大學的質素與表現。教育本身就不是一項競賽，而且每間院校也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資源、使命和定位，令簡單評比流於表面化。

另外，排名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後果。一些排名機構的聲譽調查和數據搜集耗用了院校大量的精力、時間及成本。有些院校會因應排名的個別指標重新分配資源到一些活動上，以令評分上升；這包括如添置豪華學生康樂活動設施、過份花費招待僱主、大量增加宣傳廣告預算等等。在一些地區，不同院校更為了增加評比競爭優勢而作合併。很多這些成本最後只會轉嫁到學生身上，令一些院校更具名目大幅增加學費。很多人已批評院校不應單為評分指標而作決策。

近年排名機構的一些行徑和手法也損害了其可信度。它們被形容為缺乏嚴謹性與獨立性，方法與結果具爭議。一些院校人員對這些排名已感到困惑並作出批評，甚至視為具誤導性，並拒絕參與調查或傳閱有關資料。這些流弊或問題可總結如下：

(1) 狹窄簡單化指標

不同排名機構採用不同的輸入(input)、過程(process)及產出(output)指標和不同比重，以增加新聞價值。但它們都未能針對院校的真正本質與內涵而制訂。大多數都將比重偏重於一些簡單指標如學術聲譽、國際師生比例、師生比例、高端論文量及引用率、人均研究收入及畢業生起薪點等。

以倫敦為基地的QS世界大學排名，採用七項表現指標：同行學術聲譽調查(40%)、僱主聲譽調查(20%)、師生比例(20%)、國際教師比例(5%)、國際學生比例(5%)、每一論文的引用率(5%)，及每一教授之引用率(5%)。可見SQ過份著重主觀的同行及僱用意見調查(共60%)，因此爭議性也最大。

同樣來自倫敦的THE排名，共採用5個範疇13個指標：(1)教學：同行學術聲譽調查(15%)、師生比例(4.5%)、博士生比例(2.25%)；(2)國際化重視：國際教師比例(2.5%)、國際學生比例(2.5%)、國際研究合作夥伴比例(2.5%)；(3)研究：研究聲譽調查(18%)、人均研究收入(6%)、人均研究論文(6%)；(4)論文引用率(30%)；及(5)行業收入(2.5%)。THE較QS全面，主觀成份也比較低(共佔33%)。但與QS一樣不重視課程與教學質素，及學生所學與成長等軟因素。

上海交大(SJTU)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RWU)，只採用客觀量化指標，共分四大項：(1)教育質素：校友獲諾貝爾獎與費茲傑羅獎(10%)；(2)教授質素：教授獲諾貝爾獎與費茲傑羅獎(20%)，高度獲引用的世界級研究學者(20%)；(3)研究產出：在Nature及Science期刊及在SCIE與SSCI期刊發表的論文數量(20%)，及教師人均表現(10%)。ARWU方法完全避免了主觀成份，但似乎過份偏重理工科與研究成果，指標範圍比QS與THE為狹隘。因此它不能代表一間大學的整體質素，較適宜改名為「世界大學科研排名」。

QS及THE採用一些表面化指標甚具爭議性，例如「國際教師比例」對較少土產博士及長期倚賴國際招聘的香港及新加坡院校特別有利。但這個做法卻對博士畢業生自供自給為主的北美及西歐院校極不公平。另外，大多香港院校在國際學生比例上佔盡優勢，因他們都把內地學生計算入國際學生比例內，已成為行內的笑柄。

總體來說，這些不同指標頗為狹隘和缺乏有效度，只能評估整個教育過程的很少部份。使用類似畢業生就業率或起薪的產出指標也極不恰當，因它忽視了學生的所學、其成長、及院校如何改變其視野、思維與品格態度。此外，也未能衡量院校的其他重要社會責任，如維護學術獨立自由與普世價值，傳承文化、關懷社會與全球議題、及推動社會改革創新等。這些排名報告宣稱其可利用單一數字代表質量的不同層面，但忘卻不同院校有其不同定位和發展階段。

(2) 意見調查的偏見與道德風險

除客觀數據外，大多排名指標也採用問卷意見調查(也稱「聲譽評分」)，對象包括畢業生、院校同行、與僱主等。由於群組內部份人可能更願意作回應或提供更有利的意見，這些調查卻未有預防或控制「不回應偏見」(non-response bias)。例如院校相信部份畢業生會提供較不利的回應，這些院校就有誘因及道德風險提供較少這類畢業生給排名機構寄出問卷。另外，大多答卷者一生只在一兩間院校就讀或工作，他們對自己學校作評分時無法與其他院校作比較，因此其回應往往不夠客觀理性。

至於僱主評分，這些招聘經理也會對個別院校作出偏袒，特別是其母校。僱主調查對規模大及歷史悠久的大學也特別有利。聲譽評分一般都是很表面的品牌意見調查，也算是「慣性收視率」。一些新興冒起院校的實際質素及近年的大幅改進表現，往往未能反映出來。再者，由於不認識一些冷門國家或地區(特別是非英語地區)，這些排名機構往往未有邀請有關院校參與評比。

(3) 院校提供數據的隱憂

部份量化指標數據都是應排行機構要求由院校自行提供，一般都未經外部獨立審核。所提交數據的準確性與可信性有賴院校自己的操守。但很可惜，一些院校始終經不起誘惑，向排名機構提供虛假失實的數據以爭取較高的評分。最近在《美日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全美院校排名，五間大學因被發現偽造數據而被警告或除名。這些做法對其他誠實的院校甚為不公平，也無法完全杜絕。

(4) 排名機構的潛在利益衝突

大多數國際排名機構都是具商業性質，因此有潛在或實質的利益衝突。一些機構除了進行每年排名外，也向院校提供收費高昂的諮詢及評級服務。究竟這些付費院校日後會否獲得排名好處，很難可以考證。近年有些不見經傳的院校曾付費後獲得評為最佳二百所大學之一，已引起很多人的懷疑，對其他院校也很不公平。

總結

現存大學排各畢竟是弊多於利，教育意義不大。但無論我們喜愛或痛恨，排行榜將繼續有其市場並存在。很多持份者將繼續使用(或誤用)其作評估一所院校的質素或表現。

筆者不完全反對評分或排名。但它們必須用科學化、全面、獨立及公正的方法來進行。但不幸地目前的大多環球大學排行榜都存著很多問題與流弊，其可信性已廣招批評。

深明上述的現象及需要，歐盟近年已推行一套名為U-Multirank的獨立環球大學評分系統。這系統透過深入研究與廣泛諮詢綜合了不同層面的卓越指標，以提供一個較準確及可比較的模式來衡量院校質素。U-Multirank的首次排名將於2014年出版，相信會令較多政府與院校接納用作改進其教研政策。

筆者也建議設立另一個以亞洲為基地的國際獨立機構開發類似的系統，但以評級(如A至E級或一星至五星)而非排名或評分為主。評級方法可減少隨機的統計誤差，也可減少院校每年花費額外資源以追尋排名上升。這個方法可驅使院校及大眾從一個糾纏於細微分數上落轉變到一個較平衡著重整體院校質素的過程。

但在未有一套較理想的評比系統出現之前，究竟院校領導應如何面對這些有問題的排名？筆者提議首先他們要正確了解不同排名的方法及其局限，對不信任的排名機構可主動提出拒絕被排名。第二，盡量不花資源時間作只為取得更佳排名的活動。第三，盡量不提及所獲的排名(不論好壞或升跌)，以避免出現「報喜不報憂」尷尬現象和助長這些排名的負面影響，並以維護大學教育的尊嚴。

對於大眾來說，我們可將現存綜合大學排名遊戲視為周年品牌評比，不需太認真。除了注意個別院校的當地政府認可和國際評審地位外，要自己作全面獨立的判斷。

大學教育畢竟是鼓勵人追尋真善美、共贏和奉獻社會，而非追求一些數字與名利。

作者是大學資深教授與高校高層管理，文章不代表其所屬機構